《臺大東亞文化研究》第六期　AUG 2024
DOI: 10.6579/NJEAC.202408_(6).0005

有關日本對 SDGs 採取的應對策略
——國際談判與國內實施的言說分析

服部 崇*

2015 年，聯合國通過「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永續發展目標包含 17 項核心目標、169 項細項目標，以及 232 項指標。相較於 2000 年聯合國發表「千禧年發展目標」（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 MDGs）有 8 項指標和 21 項目標，永續發展目標更加全面並納入廣泛的要素。

日本積極參與聯合國制定永續發展目標期間的國際談判，在永續發展目標通過後，於內閣成立「SDGs 推進本部」，採取各種策略來落實永續發展目標。本文採用「言說分析」的方法，聚焦日本在國際談判和國內實施上的立場，討論日本如何因應永續發展目標，於國內規劃政策及實際推動相關策略。本文嘗試對人文學與社會學交錯的日本研究，提供進一步省思。

關鍵字：日本、永續發展目標(SDGs)、國際談判、國內實施、言說分析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 日本台灣交流協會台北事務所副代表。本文僅為作者個人意見，並非日本台灣交流協會的意見。

一、前言

2015 年，聯合國通過「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永續發展目標包含 17 項核心目標、169 項細項目標，以及 232 項指標。相較於 2000 年聯合國發表「千禧年發展目標」（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 MDGs）有 8 項指標和 21 項目標，永續發展目標更加全面並納入廣泛的要素。

日本積極參與聯合國制定永續發展目標期間的國際談判，在永續發展目標通過後，於內閣成立「SDGs 推進本部」，採取各種策略來落實永續發展目標。本文聚焦日本在國際談判和國內實施互動下的立場，討論日本如何因應永續發展目標，於國內規劃政策及實際推動相關策略。

永續發展目標的執行，不只反映國際談判結果，更牽動國內實施的局勢。近年來，學界認為國際談判與國內實施，逐漸呈現一體兩面的緊密關係。國際關係學者普特南（Robert D. Putnam）（1988）提出，為了達成國際談判的協議，國內利害關係人的同意至關重要。各國如何配合國際協議的架構，在國內推動相關政策，受到各國國內資源分配的影響。例如，服部（Takashi Hattori）（1999）分析京都議定書制定過程中，國際談判與國內利害關係人的關係。服部（Takashi Hattori）（2018）關注從京都議定書到巴黎協定的各階段發展脈絡，分析日本國內利害關係人在理解國際談判與國內實施上的認知觀變化。若將這種有關國際談判與國內實施的分析應用到其他領域，永續發展目標應該可以視為是難得的研究範本。

當前，學界存在許多用來分析國際談判與國內實施的方法，本文嘗試使用「言說分析」進行考察，關注日本如何因應全球永續發展目標架構，實際在國內推動政策，來理解日本的立場與願景。

言說分析是社會學上的一種研究方法，可以應用於跨領域分析，探討不同社會情境脈絡下，做為材料的文本中出現的不同元素，是如何被創造、使用與結合，進一步鞏固或分裂成其他意義。例如，赤川（2001）提到，言說分析的基礎概念，就如同傅科（Foucault Michel）提到的問題：「這個言語表達是如何出現的？而不存在其他替代的言語表達的意義又是什麼？」本文嘗試將言說分析的概念，跨領域導入在日本研究之中。

本文使用日本外務省網站、外務省談判官撰寫的紀錄，做為言說分析的材料。在外交談判相關檔案多屬於機密文件的現狀下，可以取得外務省談判官的公開發表紀錄，

臺大圖書館期刊資料庫

顯得相當有價值。另一方面，外務省網站所刊載內容，可以視為是外務省基於自身立場所編撰而成的公開資訊，我們應該可以從這些文本中，察覺某種立場存在。

在日本，政府機關的公文、公務人員所寫的文本稱為「霞が関文学」。台灣也有類似官僚文學的概念，這類文本雖然有時候會被認為帶有揶揄的意思，但解讀公務人員撰寫的文本，有助於理解這些文本所存在的社會、文化、政治、經濟與政策。

社會科學涵蓋政治學、行政管理學、經濟學、社會學等各種領域。人文學中，則有文學（小說、詩歌）、歷史、地理等領域。為了跨越各學術領域的界線，言說分析是一個重要的分析方法，可以橫向整合、綜合性地分析各種社會現象。

接下來第二節，是根據外務省網站刊載內容，理解日本政府的立場。第三節是根據外務省南博談判官的著書為文本，分析國際談判背景下的日本政府立場。最後第四節是結論，綜合分析兩種文本的結果，探討言說分析在日本研究領域的可能性。

二、依據外務省網站的言說分析

千禧年發展目標的制定提早於永續發展目標。本節中，首先分析外務省網站對千禧年發展目標的敘述，接著分析永續發展目標的敘述。透過言說分析，探討這些敘述帶有什麼意義。

(一) 關於千禧年發展目標

外務省網站對千禧年發展目標的敘述如下：

> 千禧年發展目標（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 MDGs）是國際社會在發展上的共同目標，以 2000 年 9 月於紐約舉辦的聯合國千禧年高峰會中通過的聯合國千禧年宣言為基礎所制定。MDGs 共有 8 項目標，包括消除極端貧窮與飢餓等，在期限的 2015 年前達成了一定的成果。這些內容後來承接到 2030 年永續發展議程（2030 年議程）。日本為了構築更美好的社會，和國際社會攜手合作，重視實踐 MDGs，為了落實日本持續推動的人類安全保障，透過有效活用國與國之間及國際組織間 ODA 模式，積極地為達成 MDGs 做出貢獻。[1]

如上述，我們可以看出在千禧年發展目標階段中，日本政府高度重視聯合國與「人

[1] https://www.mofa.go.jp/mofaj/gaiko/oda/doukou/mdgs.html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類安全保障（Human security）」理念，於實務上活用了政府開發協助（ODA）模式。

除了政府開發協助模式外，日本於國內政策上，亦規劃相對應的策略，來配合千禧年發展目標。根據外務省網站上一篇專欄「日本為達成 MDGs 的策略」（發表日期：2008 年 11 月 5 日）指出：

> 2008 年 9 月 25 日，聯合國召開的 MDGs 高峰會分科會議中，中曾根外務大臣介紹日本為實踐 MDGs 所積極推動的策略，依據「第 4 次非洲開發會議」（The Fourth Tokyo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frican Development, TICAD IV）及「G8 北海道洞爺湖高峰會」成果，提出「人類安全保障」理念，強調由開發中國家主導經濟成長的重要性。
>
> 中曾根外務大臣在「貧窮與飢餓」分科會上進行演講，介紹日本為了達成 MDGs 所積極推動的策略，說明「人類安全保障」理念是日本外交政策上的一個支柱。為了實現此理念，呼籲集結對開發中國家提供援助的團體、組織、新興經濟體、國際組織、民間財團、企業、學界等多領域力量的「全員參加型」模式，以及在保健、水資源、教育、性別等領域的發展上，打造符合相乘效益的「跨領域合作」模式。中曾根外務大臣同時強調，由開發中國家自我主導之永續經濟成長的重要性。[2]

由上可知，外務省表達日本積極與國際接軌，透過主辦非洲開發會議和 G8 高峰會等國際會議，來展現推動千禧年發展目標的立場，而「人類安全保障」理念是日本外交上的重要概念。

同一篇專欄上，繼續介紹日本如何實際推動結合「全員參加型」與「跨領域合作」策略模式的成功案例。

> 結合「全員參加型」模式與「跨領域合作」模式的策略，是一種有效提供援助的方式。舉一個成功例子而言，在過去，為了對抗瘧疾，日本向來呼籲以發放蚊帳的方式來對抗瘧疾。後來，日本住友化學加入
>
> 對非洲的支援活動，開發出一款含有殺蟲劑的蚊帳，這種蚊帳透過 UNICEF 等國際組織，發放到了非洲各國。這種生產含殺蟲劑蚊帳的技術，也由日本住友化學無償提供給坦尚尼亞當地的業者，讓蚊帳能夠直接在當地生產。販售蚊帳得到的利益，有一部分被用在非洲當地的小學建設上。這種結合「全員參加型」與「跨領域合作」模式的執行策略，成功在非洲實現降低兒童死亡率、創造就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2] https://www.mofa.go.jp/mofaj/press/pr/wakaru/topics/vol13/index.html

業機會、促進經濟開發、普及小學教育等目標。[3]

我們可以得知，外務省強調日本在國際援助上扮演的角色與改善瘧疾問題的貢獻。這項成功，與執行結合「全員參加型」與「跨領域合作」模式的策略有關。

如前所述，千禧年發展目標的期限是希望在 2015 年前達成。在 2008 年的這場會議上，外務省提及對未來政策規劃的願景。

> 日本在 2008 年的 TICAD IV 和北海道洞爺湖高峰會上，表明希望在 2012 年前加倍推動對非洲的 ODA 計畫，並實施緊急支援對策來改善食品價格高漲的問題。日本也立定中長期展望目標，承諾加倍培育農業方面人才，以及加倍提高非洲各國的稻米生產量。[4]

透過以上外務省對千禧年發展目標的相關說明，我們可以理解，外務省強調日本配合聯合國，說明「人類安全保障」概念的重要性。同時，外務省也介紹了結合「全員參加型」與「跨領域合作」模式的創新策略，向大眾說明日本正積極推動策略來落實千禧年發展目標。

(二) 關於永續發展目標

外務省網站對永續發展目標的敘述如下：

> 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 承繼千禧年發展目標(MDGs)，記載於 2015 年 9 月聯合國高峰會上，由加盟國成員一致通過的「2030 年永續發展議程」之中，提到了希望在 2030 年前，達到永續發展、邁向更美好世界的國際目標。SDGs 包含 17 項核心目標及 169 項細項目標，誓言在地球上「不會放棄任何一個人（leave no one behind）」。SDGs 不只是針對開發中國家所制定，更是先進國家要致力達成的共同目標，日本也正積極推動策略。[5]

在對永續發展目標的敘述上，我們可以看到外務省強調「不會放棄任何一個人」概念。這個概念展現出關鍵意義，因為所謂「不會放棄任何一個人」，與日本在千禧年發展目標階段中提到的「人類安全保障」、「全員參加型」概念類似。

外務省網站的另一份檔案中，提示了永續發展目標的特徵如下：

> 普遍性：包含先進國家在內的所有國家都應該採取行動

[3] https://www.mofa.go.jp/mofaj/press/pr/wakaru/topics/vol13/index.html
[4] https://www.mofa.go.jp/mofaj/press/pr/wakaru/topics/vol13/index.html
[5] https://www.mofa.go.jp/mofaj/gaiko/oda/sdgs/about/index.html

臺灣學術期刊資料庫

包容性：反映人類安全保障理念，「不會放棄任何一個人」

參與性：所有利害關係人都要擔任角色

統合性：統合社會、經濟、環境面上的課題

透明度：定期追蹤進度[6]

綜觀這五項特徵，第一點「普遍性」強調不分國家都要採取行動；第二點「包容性」提示「人類安全保障」理念；第三點「參與性」對應「全員參加型」概念；第四點「統合性」說明與社會、經濟、環境課題的相關性；第五點「透明度」表示需定期檢視目標進度，進行評估管理。

事實上，在聯合國通過永續發展目標後，日本配合國際趨勢，對國內整體的政策與資源進行檢討。外務省在網站上提到：

> 自 2015 年 SDGs 公布後，日本政府首要致力強化國內基盤與完善體制，於 2016 年 5 月設置以全內閣為成員組成的「SDGs 推進本部」，由總理大臣擔任本部長，官房長官及外務大臣擔任副本部長，雙向推動國際援助與國內實施的兩大方針。在本部之下，設有涵蓋行政、民間部門、NGO・NPO、知識分子、國際機關、各種團體等集結了廣泛利益關係人所組成的「SDGs 推進圓桌會議」，經過圓桌會議上的討論，同年 12 月，日本決議通過「SDGs 實施指針」做為今後的策略規劃指引。2021 年 6 月的第 10 次推進本部會議中，決議自 2017 年以來第二次的國家自願檢視報告（VNR:Voluntary National Review）。[7]

日本於 2016 年成立「SDGs 推進本部」，以強化國內體制的方式，銜接國際推動永續發展目標的潮流，並發表「SDGs 實施指針」，做為策略規劃指引。

在日本推動永續發展目標的策略中，「人類安全保障」概念多次被提及。外務省對「人類安全保障」概念的描述如下：

> 「人類安全保障」概念注重每一個人，守護人類免於遭受生存、生活、尊嚴等既嚴重且普遍的威脅。透過個人保護和能力強化，促進打造共
> 存共榮的永續發展社會藍圖。……今後，透過更充分活用聯合國人類安全信託基金等管道，為實踐永續發展目標做出貢獻，強化確立人類安全保障概念的策略計畫，提高日本在國際開發援助上的影響力。[8]

由此得知，在永續發展目標的政策推動上，執行符合「人類安全保障」概念的策略

6 https://www.mofa.go.jp/mofaj/gaiko/oda/sdgs/pdf/about_sdgs_summary.pdf
7 https://www.mofa.go.jp/mofaj/gaiko/oda/sdgs/effort/index.html
8 https://www.mofa.go.jp/mofaj/gaiko/oda/sdgs/pdf/202005_HumanSecurity.pdf

臺灣學術期刊資料庫

有相當程度的重要性。

回顧外務省網站對千禧年發展目標及永續發展目標的相關敘述來分析日本立場，我們可以得知符合「人類安全保障」概念、促進達成永續發展目標的策略方案，被日本政府列為政策規劃考量的要素。

三、依據南博著作的言說分析

在日本，有關永續發展目標的書籍相繼出版，例如適合專業人士參考的工作用書、商業評論、手冊、兒童書籍等，針對讀者群需求，有不同切入角度。

舉例而言，蟹江憲史（2020）所撰《SDGs（持続可能な開発目標）》，是以環境政治學者觀點進行一般性評論；田瀨和夫（2020）所撰《SDGs 思考——2030 年のその先へ　17 の目標を超えて目指す世界》，是實務管理方面的書籍。

然而，這些書籍並沒有深入研究日本政府的政策制定過程，相較於此，本文採用南博（2020）所撰《SDGs——危機の時代の羅針盤》做為言說分析的材料，意義別於其他書籍，因為這是一本由政府內部的負責人所寫的書籍。

這本書是由南博和稻葉雅紀在 2020 年出版。南博在 2012 年到 2015 年間，擔任日本政府在聯合國的首席談判官，負責永續發展目標的國際談判。

本書是南博從自身角度紀錄下的國際談判過程，接下來以本書為材料，分析日本對永續發展目標的立場。

(一) 永續發展目標的國際談判過程

首先，南博在第二章「聯合國的永續發展目標談判」第一小節「SDGs 的起源」中，說明了永續發展目標的起源。

> 永續發展概念的起源，來自 1987 年聯合國所提出「我們的共同的未來」報告書。隨著永續發展概念逐漸浮上檯面，1992 年「地球高峰會」於巴西里約熱內盧舉辦，這是全球首次有關地球環境問題的大型國際會議。20 年後的 2012 年，舉辦地點再度移回巴西，舉行 Rio+20 高峰會。……各國對千禧年發展目標的質疑，是進一步銜接討論永續發展目標的起點。例如，雖然千禧年發展目標之一的「消除貧窮」，以結果看來有達到了一定的成果，但是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區，卻沒有辦法達成目標，產生了區域性的偏差。再來，千禧年發展目標項目偏向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 衛生保健議題，對改善環境議題上似乎不夠全面，而且在研擬千禧年發展目標期間，開發中國家無法參與這個與自己切身相關的議題。[9]

根據南博的敘述，我們可以理解永續發展目標的起源與兩大主軸相關，第一是地球高峰會的舉行，第二是各國對千禧年發展目標的反思。在這樣的契機下，各國開始思考後千禧年發展目標的永續發展目標內涵。

南博在第二章「在聯合國的 SDGs 談判」第二節「為達成 SDGs 協議」中，回顧了 2012 年 Rio+20 高峰會的國際談判過程。2012 年 1 月，正式啟動 Rio+20 高峰會成果文件的國際談判，大部分的國家同意應該將永續發展目標設為 Rio+20 高峰會的重要成果之一。2012 年 6 月，通過 Rio+20 高峰會成果文件。2013 年 3 月，召開第一次工作小組委員會，各國開始就永續發展目標報告書內容，進行提案與協商。2014 年 7 月，召開最後一次的工作小組委員會。南博提到，工作小組由三十個國家組成，在談判過程中遇到一些困境，例如：（1）先進國家和開發中國家有不同立場，「G77+中國」集團要求先進國家提供資金和技術援助。（2）相較千禧年發展目標有 8 項指標，永續發展目標的項目數量應該為何？（3）永續發展目標 13「氣候變遷」是否應該列為一個獨立目標？（4）目標 16「和平與包容的社會」是否該納入永續發展目標？[10]

以上我們可以了解，為了達成國際談判上的共識，需要經過一段很長的時間。由於各國有各自立場，這些立場要如何在談判過程中被轉換成可以被溝通的元素、產生實質對話來達成共識，值得我們觀察。

擔任日本首席談判官的南博，回顧 2014 年 7 月召開最後一次工作小組委員會上，以日本立場進行發言。

> 現在，我們在書面上列下的核心目標和細項目標，看起來十分具有野心。然而，遺憾的是，我們不能將這些內容縮短成更精簡有力的文字。另外，就日本的立場而言，我們應該結束工作小組的協商階段，轉而支持共同議長的決定，往下一階段邁進。[11]

南博的言論透露出立場轉折，他表明日本的觀點，透露希望談判順利往下一階段邁進的期望。我們可以理解，這種遵循共識的立場帶有重要訊息。

有關日本在國際談判中的立場，南博在第三節「超越先進國家和開發中國家二

[9] 南博，《SDGs——危機の時代の羅針盤》（東京：岩波書店，2020），頁 34-35。
[10] 南博，《SDGs——危機の時代の羅針盤》，頁 37-52。
[11] 南博，《SDGs——危機の時代の羅針盤》，頁 55。

臺灣期刊資料庫

分法」中，提及「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CBDR: Common But Differentiated Responsibility,以下簡稱 CBDR）概念如下：

> 在永續發展目標的討論上，承認先進國家和開發中國家的這種二分法概念，來自 1992 年里約地球高峰會上的共識。這是「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CBDR: Common But Differentiated Responsibility）概念。……CBDR 是 1992 年里約地球高峰會中達成的里約宣言第七條原則。『從對地球環境惡化的不同影響力看來，各國有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12]

由此可知，CBDR 概念來自里約宣言第七條原則，限定於環境破壞的議題上。對聯合國來說，處理各國對 CBDR 的認知理解，一直是一個重要的問題。

南博提到，永續發展目標涵蓋了比環境問題更全面性的發展問題。對於將僅限於環境破壞的 CBDR 概念，加以適用到永續發展目標的全體原則上，應該抱持更謹慎討論的態度。[13]

如上所述，我們可以理解，依據南博的看法，CBDR 概念中存在「先進國家」與「開發中國家」的區分。然而，這種將國家「二分法」的思考模式，不見得適用在永續發展目標的框架中。為了落實永續發展目標的理念，需要將各國視為行動主體，這顯示出國際間「全員參加型」模式概念。

(二) 日本政府的永續發展目標政策

因應聯合國在 2015 年通過永續發展目標，日本政府成立「SDGs 推進本部」，連結國內能量來推動永續發展目標。上一章中，我揭示了外務省網站對這個推進本部的說明，這一節中，南博對「SDGs 推進本部」描述如下：

> 2016 年 6 月，納入全內閣成員的 SDGs 推進本部在內閣官房設立，由內閣總理大臣擔任本部長。推進本部的會議半年舉行一次，目的是將 SDGs 納入主流並推動落實，政府制定推動 SDGs 的國家戰略——SDGs 實施指針。……我們需要了解，SDGs 不僅是外務省的問題，而是全體政府都必須參與其中。這個推進本部，就是基於這個觀點而成立的。[14]

南博在這段敘述中，提到永續發展目標不應該僅是外務省的問題，而是全體政府都

[12] 南博，《SDGs——危機の時代の羅針盤》，頁 65-66。
[13] 南博，《SDGs——危機の時代の羅針盤》，頁 67。
[14] 南博，《SDGs——危機の時代の羅針盤》，頁 75-76。

臺灣期刊資料庫

需參與其中。日本制定「SDGs 實施指針」，是國家戰略之一，為了實踐永續發展目標付出努力。

南博也提到，「SDGs 實施指針」內容會逐年更新，在 2019 年修訂的版本中，提及日本的目標是在 2030 年前，在國內和國外都能實現永續發展目標的願景。但這項聲明並未出現在 2016 年的版本中，因此可以視為是向前邁出一大步的明確聲明。[15]

第五章「到 2030 年的行動十年」第一小節「SDGs 峰會」中，南博提及聯合國秘書長在 2019 年 9 月 24 日至 25 日舉行永續發展目標高峰會上的報告。他說，秘書長強調，就現階段而言，對於要在 2030 年達成永續發展目標，人們所付出的努力和轉型速度並不足夠。自 2015 年以來，圍繞永續發展目標的整體國際情勢，似乎已經日益動盪並趨於惡化。[16]

2019 年，聯合國提高討論永續發展目標的峰會層級，舉行首腦會議。南博寫道，在首腦會議發表的政治宣言中，各國重申呼籲實現「不放棄任何一個人」的理想，同時鬆口承認在達成永續發展目標的進度上，有相當程度的挑戰。南博說，對於這樣的表態，可以理解為在 2019 年的這個時間點，這項聲明被解讀為嘗試正視問題，永續發展目標在實踐上面臨許多困難。[17]

以上透過南博的論述，我們可以掌握日本對於永續發展目標的談判立場，尤其是日本在談判過程中，表明了對先進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立場衝突的憂慮。然而，這本書有趣之處在於沒有使用「人類安全保障」概念。書中雖然提到永續發展目標的核心價值是「以人為本」，但卻沒有採用「人類安全保障」概念，值得我們再三思索。

四、結論

本文使用言說分析，探討日本如何因應國際談判，制定國內實施的策略。具體而言，我嘗試利用外務省談判官對國際談判和國內實施的描述紀錄，了解日本對永續發展目標的立場，以及相對應的策略制定模式。透過比較千禧年發展目標的相關內容，更清晰描繪永續發展目標的輪廓。留意國際談判情勢與國內實施的動態複雜關係，可以讓我們有更多立足點，因應當代永續發展目標的潮流。

臺灣學術期刊資料庫

[15] 南博，《SDGs——危機の時代の羅針盤》，頁 78。
[16] 南博，《SDGs——危機の時代の羅針盤》，頁 151-154。
[17] 南博，《SDGs——危機の時代の羅針盤》，頁 155。

本文中，我使用了外務省網站內容、外務省談判官的著作做為言說分析的材料。這些材料是一種媒介，可以指引我們掌握日本的立場。透過詮釋文字背後的脈絡，我們理解文字可以既為表面、又為整合了多種意義的複合性話語。

本文也嘗試對所謂的官僚文學，進行不同解讀。透過言說分析我們可以發現，在千禧年發展目標階段中，日本使用「人類安全保障」、「全員參加型」模式等關鍵字，這些關鍵字在進入永續發展目標階段後，仍舊持續被強調和使用。由此可知，這些概念在塑造日本外交政策上，發揮了不可小覷的影響力。

最後，本文嘗試將社會學的方法帶入日本研究之中，希望為人文學及社會科學交錯的日本研究，提供進一步省思，激盪出更多不同觀點的火花。

致謝

謹在此感謝國立台灣大學日本研究中心，提供我機會在 2023 年 10 月 21 日至 22 日舉行的國際學術研討會『展望人文學與社會科學交錯的日本研究發展新未來——以 SDGs 目標 1「貧困」為中心』上發表及產生對本文的構想。也感謝洪上婷小姐對本文的研究及翻譯上的協助。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參考文獻

赤川学，〈言説分析とその可能性〉，《理論と方法》，第 16 巻第 1 号，2001。

蟹江憲史，《SDGs（持続可能な開発目標）》，東京：中央公論新社，2020。

南博、稲場雅紀，《SDGs――危機の時代の羅針盤》，東京：岩波書店，2020。

田瀬和夫，《SDGs 思考――2030 年のその先へ　17 の目標を超えて目指す世界》，東京：インプレス，2020。

Hattori, Takashi, "The Road to the Kyoto Conference: An Assessment of the Japanese Two-Dimensional Negotiation," *International Negotiation* 4:2 (1999), pp.167-195.

Hattori, Takashi, “Japanese Foreign Policies on Global Climate Change: From Kyoto to Paris,” in M. McCarthy, ed. *Routledge Handbook of Japanese Foreign Policy*. Abingdon: Routledge.2018.

Putnam, Robert D., "Diplomacy and Domestic Politics: The Logic of Two-Level Gam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42 (Summer 1988), pp.427–460.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Japan's strategy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A discourse analysis on international negotiation and domestic implementation

Takashi Hattori

Deputy Representative, Taipei Office, Japan-Taiwan Exchange Association

In 2015, the United Nations adopted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 which consist of 17 goals, 169 targets, and 232 indicators. Compared to the previous 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 (MDGs) which had 8 goals and 21 targets, SDGs cover a wider range and have a more comprehensive nature. Japan actively participated in the international negotiations for formulating the SDGs at the United Nations and has made efforts to implement policies and actions domestically related to achieving SDGs. To effectively achieve the SDGs, Japan established the "SDGs Promotion Headquarters" under its Cabinet. This paper presents a discourse analysis of Japan's active involvement in the formulation of the SDGs at the United Nations, as well as its domestic implementation of related initiatives after the formulation of the SDGs.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explain Japan's actual situation and the reasons behind their response to the SDGs and provide reflections on Japanese studies at the intersection of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Keywords: Japa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 international negotiation, domestic implementation, discourse analysis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